



政學系
民社黨
青年黨
介紹

吃人
害人
殺人

東北書店分印

1948.8

政學系民社黨青年黨介紹

東北書店印行

目 錄

政學系介紹	新華社	(一)
政學系人物介紹	浩	(五)
民社黨介紹	新華社	(八)
民社黨的歷史道路	王坪	(十)
民社黨的上鉤	煉風	(十三)
「民主」憲法換洋房	洗書	(十六)
談附庸為好的張君勱		(十八)
青年黨介紹	新華社	(二十)
青年黨外史	陳永年	(二十三)
青年黨的故事	吳格	(二十八)
青年黨爭權奪利內閣記		(三十四)
青年黨的眞面貌	史敬棠	(三十七)
「中私黨」如此這般	林南	(四十六)
「孫科原形畢露」	新華社時評	(五十)

政學系介紹

蔣介石

蔣介石這次「改組政府」，除了原有的一批「復興」，「CC」法西斯份子外，新加進去的成份主要的是三種：一是官僚財閥的政學系，二是由保皇黨研究系出身的民社黨，三是國家主義派的青年黨。現在把政學系的歷史介紹於後：

「政學系」是蔣介石四大嫡系之一，蔣介石歷來的分工大體是「政學」管政，「復興」管軍，「CC」管黨，親屬管財。「政學系」雖然由於缺少兵權，在將政府中樞的地位呈時起時落狀態，但在地方政權中，却歷來與「CC」「復興」平分秋色的，尤其在政治緊要關頭與重要地方，蔣介石總是要用「政學系」的。十年內戰中，楊永泰就是剿共總司令部的秘書長；黃郛是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張群是「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市長和外交部長，抗戰期間又任四川省主席；陳儀是福建省主席，後來又任台灣長官；熊式輝是發動東北內戰的行轅主任。這次蔣又拉張群出任行政院長，企圖渡過其歷史上最困難的難關。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政學系」不僅執掌了蔣介石獨裁統治下的行政權，而且代替孔、宋掌握了財政權。「改組」之前，宋子文就已「辭職」，以「政學系」張嘉璈（號公權）代替宋系的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做了四大家族的直接經紀人。「政學系」遠在北洋軍閥時代就與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北方四行」的領導人。南京政府成立後，「北方四行」的地位雖然逐漸為「南方四行」（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所代替，並進而變成「南方四行」的附庸，但在交通銀行中，「政學系」仍較「CC」兩陳保有優勢，行長錢新之就是接近「政學系」的人物；而在地方銀行中，「政學系」仍然具有有力的地位。

在此大「國府委員」中，有個叫陳耀德（號光甫）的，也是兼孔桃家與「政學系」的四大家族經紀人之一。蔣介石以張公權爲中央銀行總裁，陳光甫爲國府委員，不是偶然的。以他們來代替孔、宋兩買辦，爲的是希望藉此彌補一下孔、宋、美國人中多少失去的信用，裝飾其所謂「自由主義份子」的門面。實際上張、陳原來就是親美份子，一向也是替蔣介石借外債的老手。這兩個人爲美國所熟悉的買辦，早就得到華爾街老闆的賞識。行政院「改組」後，外長王世杰、財長俞鴻鈞都是親「政學系」的份子。其他如翁文灝、玉雲五、莫德惠、穆嘉銘、谷正倫、雷震等也都是接近「政學系」的。

在這次「改組」後，蔣府人物中，「政學系」的確成了主要成份之一。但必須弄清，蔣介石政府中軍閥、黨閥、特務的控制力是一點未減弱的。軍權仍掌握在醉心內戰的「復興」系手中，而且接近陳誠集團的張厲生、俞大維、朱家驊、谷正綱等仍然保持原來的部長位置。而在地方政府主席中，「復興系」仍佔很大的比例。同時，操縱黨權的「CC」系仍支配着黨務特務組織，而蔣介石以「CC」頭子陳立夫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秘書長，正是以此牽制「政學系」，好便於他利用狗打架的矛盾來操縱他們。至於財權，「政學系」也不能獨攬。孔、宋系的人物（貝祖貽等）雖不拋頭露面了，但在中中交慶四行中，孔、宋仍有其相當地位。所以不論其如何「改組」，實質上蔣介石仍然是駕臨於這四個嫡系之上，維持其獨裁統治。

何以蔣介石現在如此器重「政學系」呢？

在中國近代史上，政學系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政客集團。從民國六、七年間國會分裂時，「政學系」即利用李根源參加西南討袁的地位，在西南正式組成。當時曾勾結滿清遺老岑春煊排斥孫中山，主持西南軍政府，與北洋軍閥分享中國的統治。以後南北議和，「政學系」成爲西南與北洋軍閥妥協

的媒介。從此「政學系」先後參加了徐世昌、曹錕政府，成爲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官僚集團。並利用其政治地位，成了北方官僚資本的中堅，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以及「北方四行」的大亨，其代表人物便是吳鼎昌和張公權。

北伐之時，張群首先代表北方軍閥至廣州和南昌，與蔣介石進行勾結拉攏。於是做爲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的南北軍閥取得了合作默契，而蔣介石的叛變革命，亦以槍決贛州工會委員長陳贊賢爲標誌而開始。不久以後社會上盛傳「軍事北伐、政治南伐」；其政治南伐的代表人物，就是張群。以後「政學系」的另一代表王伯群跑到上海拉攏其妹婿何應欽，擴大了「政學系」在蔣系軍隊中的活動範圍。

自此以後，「政學系」就成爲南京蔣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成份。反對孫中山主張最厲害的楊永泰，這時成了蔣介石最親信的助手。楊永泰被CC系打死了以後，張群就繼續起爲「政學系」的領導人物。「政學系」對外賣國、對內殘民的政策，並不亞於CC、復興及親屬等三系。例如著名親日份子黃郛，在北平主持政務委員會時期的親日賣國，屠殺青年；楊永泰在內戰時期的實行保甲制度，荼毒人民；張群做外交部長時期的親日賣國；沈鴻烈在山東當主席時期的通敵反共，屠殺人民；以及不久前陳儀在台灣的血殺、貪污行爲等等，均其明證。

「政學系」的專長，是用敷衍手段，爲反動統治粉飾門面，欺騙群衆；這就是蔣介石所以必須重用他們的緣故。但時至今日，當蔣介石統治集團更加腐敗脆弱無能與接近死亡的時候，當廣大人民的覺悟空前提高，人民解放軍日益勝利的時候，其欺騙作用，將很快被揭穿而宣告破產。

「政學系」的代表人物死掉的有楊永泰、黃郛，現在則是張群、吳鼎昌、張公權、吳鐵城、熊式

國、沈清、沈、陳、李、

政學系人物介紹

媚外專家張羣

張羣現在是蔣「政府改組」後的行政院長。也是今日政學系的領袖。其人老奸巨滑，在蔣政權內跌撲不倒。過去以親日爲蔣介石所賞識，今日以能爲「美國理解」爲蔣介石和美國反動派所重視。張羣在過去做過蔣政府上海市長、外交部長、四川省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冬起當外交部長期間，正當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華北特殊化」問題鬧得很厲害的時候，張羣對日本軍閥所提出的無理要求像「禁止抗日」等一一接受。得到「親日外交家」的稱號。做四川省主席期間，則又是一個刮地皮害人民的能手，弄得四川今天民窮財盡、民變遍及全省。

日本投降之後，他看到人民力量的生長，曾扮做國民黨裡的「自由份子」，而在去年突然出國赴美。回來之後，在蔣管區早就傳說張羣要做行政院長了。這是張羣由親日到媚美的成功，跑美國一趟回來，果然高踞「行政院長」高位了。

張羣這一次登踞高位後，必然的要拿出過去親日本領轉而親美，拙當起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清道夫的角色。但這是張羣的登峰造極，他的前面已沒有前途。登台以來，已連連哀叫處境困難

了，這種新的哀叫，在張群還是第一次。張群的末途，從他自己的哀叫中已可看出。這一個善於媚外賣國的政學系領袖，絕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很快就要被人民把他從歷史上抹去。

財閥巨頭張嘉璈

此次蔣政府「改組」前，政學「做了『西大家族』的直接經紀人。由吃銀行飯出身的張嘉璈（公權）舉攬了蔣記中央銀行大權，當了總裁。

張嘉璈在中國銀行界是可算上一個的，從日本的慶應大學學得「套做財閥的本領回國後，當時（民國二年）正是袁世凱當道，梁啟超還正起勁「保袁」時，張嘉璈走了梁的門路，加入「進步黨」，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張的投奔梁啟超，原來的目的是想在「政治」方面有所為的，但梁正在沒落，所以在民國二十四年前，張嘉璈就在銀行界混，未做過「一官半職」。

但張嘉璈在中國銀行裡的地位却是「一帆風順」的一升再升，從分行的副行長而總行副行長、總行行長。終爬出了頭，成了中國有數的顯赫的財閥巨頭之一。在蔣記中央銀行未開辦前，當時蔣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每遇困難時，也常要移樽就教，請求於張。而在民國二十五年春，張嘉璈以允許蔣政府在中國銀行加入「官股」的條件，到底換得了一個鐵道部長的高位，以後鐵道部改交通部，張嘉璈仍繼續幹部長。「勝利」後，曾去東北做官，這次作了四大家族中央銀行的總裁。

張嘉璈在中國銀行就以推行紙幣得手而迅速高升的。目前蔣政府正以發行紙幣掠奪人民財富為應付龐大內戰經費的主要手段，蔣介石選中張嘉璈的條件之一，大概也就是這一點。

張嘉璈雖是「高升」了，但他的「為除加深掠奪人民程度之外，也必然加速其自身的崩潰。

北方財閥吳鼎昌

吳鼎昌（達銓）現在是蔣政府的文官長。他頗張嘉璈一樣，是中國有數的財閥巨頭，北方金融資本家代表之一。但他的得以混入官僚場中，更多一個工具，他擁有一個大公報。

『大公報不公』，現 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然而大公報在過去曾起過相當欺騙世人的作用的；蔣介石很早就暗在暗中津貼它。到民國二十五年春，吳鼎昌由大公報經理一躍而為蔣政府實業部長，就是大公報被完全收買談判的成功。

吳鼎昌做實業部長期內，由於前政學系領袖楊永泰受CC系妬嫉被彼等打擊，未得『大獻身手』做到實業部長下台，做了邊疆大員貴州省主席後，才施出混身招數，拿出原來的商人本領，在老百姓身上發起財來。

吳鼎昌是懂得『做官發財』三昧的，貴州是有名的生薑鴉片地方，他在收買了大量鴉片之後，公佈禁吸禁種的辦法，於是烟價大漲，吳鼎昌在一轉手間發了大財。其事雖有人一直控告到蔣介石面前，于右任的監察院也派人調查，並且查出真憑實據來，但吳鼎昌却仍能安然在位。其次在所謂『發展電氣事業』上，吳鼎昌把材料費提高幾成，一面限令貴州各縣創辦電廠、電話、電報等，既發了財，又收了『建設』美名。

『勝利』後，吳鼎昌飛返南京，一面做蔣政府的文官長，一面從事他沿海及北方金融勢力的重建。

民社黨介紹

新華社

「民主社會黨」是由「國家社會黨」與華僑中的「民主憲政黨」合組而成。這兩黨的前身都是滿清時候的保皇黨。保皇黨是清末戊戌政變時康有爲、梁啓超所領導，他們與孫中山的革命的同盟會是一向處於敵對地位的，辛亥革命後，康有爲就一直主張保皇；雖然這種主張在張勳復辟不成後已告失敗，但康有爲的黨羽在海外却一直反對革命，直到蔣介石的南京反動政權建立以後，他們在海外才組成「民主憲政黨」，這就是現在加入蔣政府的「國府委員」伍憲子及「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大明所領導的黨。與康有爲齊名的梁啓超則「保皇」不成變而爲「保袁」，組織「民主黨」，後成「研究系」，幫助袁世凱反對孫中山，鎮壓革命，解散國會。但等到袁世凱走得太遠要實行帝制時，梁啓超却認爲「不是時候」，又轉而擁護岑春煊討袁，接着則又擁護段祺瑞反對孫中山，主張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又不斷參與北洋軍閥的混戰。這就是研究系爲反動軍閥幫兇的歷史。民社黨今日的「領袖」張君勱（原名張嘉森，爲張嘉璈的胞兄）及他的不少同黨，當時都是追隨研究系梁啓超的。現在則繼續了梁啓超的傳統，在「保皇」「保袁」「保段」之後，又來保蔣。與張君勱同黨的湯任心（就是湯薌銘）是研究系湯化龍的弟弟，是袁世凱時代的湖南督軍，被湖南人民緝之爲「湯屠戶」的。抗戰時期，湯任心在北平做了漢奸，與在上海、南京領汪精衛政府的津貼的會琦，成爲民社、青年兩黨遙遙相對的南北二漢奸。應該記着：當去年重慶新華日報宣佈湯爲漢奸時，蔣介石的中央日報却說他是「抗敵不屈」，張君勱亦曾稱他狡辯過。可是北平人民沒有不知道湯薌銘是個大漢奸的。這次代表

民社黨加入蔣政府爲「國府委員」的駁翼翹，更是人所共知的北洋軍閥奉系餘孽。他是什麼時候和研究系（或國社黨）發生了關係，無人得知。但他現在居然一躍而爲民社黨的組織部長，並且成爲「國府委員」，這真真使那些尙未死掉的北洋軍閥餘孽自愧不如，也無怪沒有得到「府委」的另一軍閥餘孽湯壽銘要與張君勳火併了。

張君勳除了整個海外保皇黨、國內研究系和漢奸軍閥外，沒有在他左右不離的兩個集團：一個是家屬集團，即他的兄弟姐妹親戚，這是推動他擁蔣的一群蔣家官吏；另一個是徒弟集團，代表人物爲他的徒弟蔣勻田，一心一意要過官癮。所以民社黨只是一個保皇黨、漢奸、軍閥、家屬、徒弟的集團，恰恰也是中國封建士大夫中最腐朽的一群。他既沒有廣大的社會基礎，又不能代表任何真正自由主義的思想，連民社黨內張君勳的反對派也公開指責張爲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獨裁者。他們之所以如此急於參加反動的蔣政府，無非是看到自己階級的日趨沒落，想以「保蔣」來支撐一番。但其結果將與當年保皇黨、研究系之「保皇」「保袁」「保段」一樣得到同樣悲慘的下場。

民社黨的歷史道路

王 輝

民社黨這兩天又忙起來了……忙於準備參加政府，也忙於否認參加政府；忙於強化內部，也忙於削弱內部。參加國大健將蔣勻田的不斷發言參加政府及來去京滬，是第一種忙的典型，孫保毅的不願發言又不得不發言是第二種忙的典型；已離脫黨的張東蓀先生的南下及葉篤義的搬出愚園路民社黨總部，是象徵了第三、四種的忙。

第一、二種忙，實際上是幫忙——幫政府的忙。政府當然也陪着民社黨忙；蔣介石的徵安民社黨國大代表，孫科，雷震的來滬，都是促成民社黨忙的原因。

但是，無論民社黨怎樣忙法，人們已經沒有興趣推測他們會忙出意料以外的新花樣。一般人意料中的民社黨，是在起了一個分化後張君勱麾下的民社黨必然參加政府，雖然張君勱還可能像參加國大一樣的把頭露在水面上。

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張君勱的悲劇。

當民社黨還是「保皇黨」，還是「進步黨」，還是「研究系」或者是「立憲派」的時候，他們便「可以俯首遷就，到了他們不能活動的時候，也可偶然加入革命黨，但時局一定，他們便仍然又依附勢力、托庇勢力之下以從事活動」（高一涵語），故他們的參加革命黨——用現在的事實來說，他們的參加同盟，成第三方面的一員，那不過是「偶然」，參加「國大」，參加政府，依附勢力，托庇勢力之下活動才是必然。他們的鼻祖梁啟超的先張君主立憲，繼談虛君共和，隨後且擁護與日本勾結

的段祺瑞，最後又參加曾經反過的革命政府，在在都是「處於因利乘便的地位」。

民社黨的參加「國大」，除了上述的歷史的必然性外，還有便是張君勱的悲哀。

我說的張君勱的悲哀，不是悲哀他的「九十九分忠孝」（梁秋水語），而是悲哀他跳不出家族的圈子，甚至為家族的利益這一私念而犧牲了自己的聲譽與民社黨的前途。

大家都以為民社黨的參加國大是由於張君勱「忠厚」，加上蔣勻田等的私慾，後者是對的，前者則不妥。實際上，「忠厚」的張君勱還存了一分私心，那就是對於他家族的利益和他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政學系的要角張嘉璈（公權）是張君勱的弟弟，今日的張公權是政府的封疆大吏，他担心乃兄違背政府的主張及行為影響到他的地位，政府利用這一點要他去拉攏張君勱出山，他這樣做了。但最初並沒有效果，張君勱在十月裡隨周恩來及第三方面代表晉京和談，看見蔣介石當天便飛台灣時，異常不滿，後來商談中政府代表堅持用蔣介石的八條做基礎時，張君勱激昂地主張第三方面代表應立刻回上海。

以後，張公權與他的妹妹——故詩人徐志摩的夫人張友儀聯絡一氣，通過張友儀去拉張君勱便成功了。因為張君勱夫人死得早，與自己的守寡妹妹感情特別好，很多事情都很尊重其意見，而張友儀又利用了：一，財務部長（張友儀為民社黨財務部長）的職權，把張君勱在美國用民盟名義募得的美金及民社黨其他的經費都控制了，說話的力量當然大大增高；二，以「第三者」的立場勸張君勱，說什麼「公權的地位如何高，你攪了一輩子，幾乎毫無成績，趁人和編冊都對編冊，你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低落」，等等。張君勱平時確實遭受到族人的輕蔑，他就不甘在花甲之年再寂寞了。更加上政

府的推，青年黨的拉，蔣介石等的推，他便在否認聲中交出國大的名單來。

(一月十四日「文匯報」)

民社黨的上鉤

煉風

自從十月間政府發動和平攻勢，「肉請帖」把周恩來請回南京之後，民社黨內部就亂得像一個被攪動了的蜂窩。爲什麼會亂？大家知道：「國大」開會之前，對張君勱曾用盡拉攏功夫，三日一宴，兩日一談，弄得這位「學者」黨魁受寵若驚，舉止失措。同時還有一大群特使的包圍，吳鐵城，張群之外，張公權是他弟弟，張宥梅是他妹妹，這些人調起門來講理自然要比「外面人」的話更加容易入耳，而黨內呢，這個黨本來就是一個封建性的家長制領導，平時從來就沒有民主討論的習慣，葉篤義孫寶剛等人不一定贊成參加國大，可是等到事情發展到上面的黨魁搖搖擺擺，拿不定主意，而下方的「群眾」又議論紛紛，七嘴八舌的時候，所謂「中堅」層就失去了控制的作用，從十月到十一月初，政府方面或明或暗的開出了一大疊政治支票，這些許諾經過蔣勻田、金候城散布到張君勱的「學生」中間，立刻就在民社黨的下層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民社黨正式發表參加國大之前，實際情形是「名爲人情與義理之交戰」，「實爲權利到節操之鬭爭」。葉篤義、孫寶剛飛平，胡海門飛滬。前者是「討救兵」，後者是「看情勢」，因爲那時候在寧在滬，民社黨的陣地實際上已經被金體政毀，主帥張君勱已經被自己的部下包圍起來，帶推帶送的向政府的軍門去講條件了。梁秋水在北平聽到民社黨出席「國大」而放聲大哭，對記者說：「君勱什麼都好，就是耳朵太軟，經不起小人包圍」，至於包圍的情形如何，十二月五日在上海文匯報有一段話描寫得相當清楚：

「民社黨中有一批張君勱的學生，這些人教書不能當教授，做官做不到竹字頭（按指簡任級），

賺的錢不足以養老婆，又看到政府的軍事優勢，就想乘此謀一官半職，他們包圍了張君勱，民黨黨的常委在上海開會，這批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闖進來七嘴八舌，上海幾個常委都沒有了辦法。」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沒有北平張東蓀梁秋水的堅持不屈，老實說，民黨黨的參加國大名單也許會和青年黨的同時提出，而提出名單中間也許會有張君勱的名字。所以這一堅持不能不使張君勱有了較爲慎重的考慮，可是考慮了之後爲什麼終於半推半就地提出了「沒有黨首的名單」？那麼問題就得提到另一種推使民黨變節因素，這就是民黨動搖時期始終不露面的背後策動者馬歇爾了。十一月初，馬歇爾心悴苦悶到了極點，「國大」開了，周恩來走了，馬歇爾深深感到了一黨國大的欺騙性太薄弱也太暴露，如此一來，馬歇爾勉強還可以「關」一下國際國內的把戲就會全部破產，因此他在這重要關頭必須佈置兩齋棋子，其一是把民黨送進「國大」去支持所謂「政協憲草」，以加強其欺騙性（後來民黨就用了這個題目作爲藉口）。其二是留張君勱在「國大」名單之外，不切斷張東蓀之覬，企圖從此造成一道「四張之橋」，作爲「國大」之後，軍事優勢喪失之後再開和談的中間勢力。所謂「四張」，張群，張公權，張君勱，張東蓀是也。張群由美國回來，美國在中國政治圈子裡看中了政學系，已經是週知的事實，那麼由張群與張公權的政學系關係的一轉而到張公權與張君勱的兄弟關係，再由張君勱與張東蓀的老朋友關係，不是「萬里姻緣一禮拜」，從此又可以接觸到民盟，而再形成一個「第三方面」了麼？馬歇爾把這個計劃告訴了張君勱，另一方面再由張公權在「回任的途次」逗留北平，把這意思告訴張東蓀，這次梁秋水胡海門的南來是由於張公權的「教請」，他們兩位的情況是由張公權代訂，敏感的讀者就可從此看出一點幕後的佈局來了。

大體來說，對於參加「國大」，對於參加政府，張東蓀的態度是堅定的。張東蓀在民黨參加「

國大」前致書張君勱，有「民社黨參加國大之日，即弟等脫黨之時」的宣告，後來，由於張君勱函電交馳，訴述苦衷，於是北方的決策改爲民社黨參加政府，「北方同仁一致脫黨」。梁胡兩來，是先一步看一看「黨內」實際情況，打聽一下美國方面的未來方案，如覺得「和談的時機可以再來」，那麼民社黨可能「重新整頓一下黨務」，而回復到「中立性」的地位來「從事奔走」。當然，所謂民社黨的北方派張東蓀和梁秋水之間也還有相當的距離，特別是在對民盟的關係這點。這是民盟中委，這次一直堅持着民盟的立場，政協的立場，而梁秋水呢，基本上是一個「不黨主義者」，他的這次反對參加「國大」，與其說是爲了堅持政協原則，毋寧說是爲了老一輩人的所謂「節操」，和特別是對漢奸湯薌銘（即湯住心）的反感。

（錄自重慶新華日報）

「民主」憲法換洋房

沈 書

一天，好幾個新聞記者在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劉攻芸的辦公室裡，正聽劉攻芸的結束報告，突然，來了南京長途電話，一件見不得人的機密，無意間讓記者們知道了。電話裡說的是，蔣介石曾經手令行政院，要處理局在上海的敵偽產業裡，撥一塊地方給號稱「學者」的張君勱。大概是張君勱等得不耐煩了，因雷震來滬之便，向雷震問了起來，雷震便去問劉攻芸，爲啥不撥。劉攻芸回說沒有看見行政院的公事。雷震說是「主席」有令，立刻辦理。劉攻芸立刻打電話給南京行政院的祕書朱仲道，朱在電話中說是有此一事，早已命令處理局辦理。

在劉攻芸和記者們談話當中，祕書長沈冠亞果然找來了公事，劉攻芸便一邊談話，一邊翻公事。其時，記者們早已無心聽處理局的報告，心裡老是盤念着張君勱要吃到嘴的這塊肉了。一位坐在劉攻芸旁邊的記者，伸着脖頸偷看了一下公事，赫然幾個大字，「虹口花園洋房一幢」。劉攻芸發覺了這位記者的一付俄狼似的眼睛，立刻把公事往身邊一拉，雙眼一瞪，這位記者目的已達，輕鬆一笑，功德圓滿。

怪只怪當時的電話出毛病，劉攻芸的話，對方老是聽不見，逼得劉攻芸大聲長嘯：「一塊地皮，地皮，地皮」，「張君勱」，「張公權的哥哥」，「委員長的命令」……還附帶的罵了電話局一番，依然聽不清，最後，還是講話清楚的祕書長沈冠亞接替，對方才聽見了。設若電話不出毛病，輕輕幾

句話，就此交代，也不會給新聞記者聽去了。

某報說民社黨領津貼，民社黨惱羞成怒，說是要打官司。這幢花園洋房，用什麼換來的，我也不敢揣測了。

（『評論報』第玖期）

談附蔣爲奸的張君勱

爲民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但自絕於民盟；爲政協的參加者，但背叛了政協決議，自毀名節，自尋死路，得了『曾琦第二』的稱號的張君勱，大概有很多人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吧？現就所知道的介紹如下：

他是江蘇寶山人，原名嘉森，曾任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在五卅運動後，中國學術界積極提倡民主和科學，張氏就起來反對。一九二三年二月，他在清華大學講了一次『人生觀』，認爲科學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因爲『人生無是非真偽的標準』。結果引起一次『人生觀問題大論戰』，又名『科學與玄學』之爭，而反科學的張君勱，就得了『玄學鬼』的學術命名，不辨『是非真偽』，是我們想認識他的爲人必須掌握的一點。

沒有大事可記，我們就把步子邁得大一些，談到抗戰期間吧。初期他的表現非常糟，竟糟到和那時還未投敵的汪逆精衛一個鼻孔出氣，散佈投降空氣，主張走德、意（日寇的朋友）路線；但總還算不壞，還不會和汪逆一起跑了。那時他反共很積極，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曾提到爲了反共，國民黨反動派『……僱幾個玄學鬼，再加幾名托洛茨基，搖動筆桿槍，亂喚亂叫，亂打亂刺了一頓』。這『玄學鬼』就是說的張君勱及其黨徒們。

但後來由於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獨裁，不但不允許中共合法存在，其他黨派（即使是它的應聲蟲）

，也沒有有一個不是橫遭壓迫的，張君勱在這種情況下，才感到國民黨的盛氣凌人，隨它成共也沒有自己的一點好處，才感到有與民主力量聯合的必要。民國卅年「民主政團同盟」（民主同盟前身）成立，他也是發起人之一。不管他的觀點，常有些模糊，但一直到他決定民社黨參加御用「國大」止，總還算站在民主的立場上。但他竟不珍惜這一段光榮的歷史，而去任獨裁內戰專家上演民主滑稽劇——「國大」中的一個可憐的角色。似乎自己也受到精神上的責備，所以弄得躲躲閃閃，半推半就（其實早就全投入人家的懷抱中了）。越裝腔作勢越讓人覺得醜態百出。自作自受，除了輕蔑鄙視外，人們是沒有替他可惜的！

（節錄大連日報）

青年黨介紹

新華社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由於感到民族的危亡，遂發生了兩種情形：一種是認識了人民力量偉大，從事革命運動以求民族的解放；另一種則是承襲了封建買辦傳統與剝削思想，夢想在廢墟上維持其權威的統治，結果只有走上反動賣國的途徑。前一種是中共及進步份子大多數人所走的道路，後一種就是青年黨極少數人所走的道路。所以不管中國青年黨的領導者怎樣誇耀他們也出身於「五四」運動，也會參加過愛國運動，但當他們一開始組黨時，即與中國的進步份子走了相反的道路。青年黨的綱領與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但他們所抗的「強權」，不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而是以平等待我之蘇聯；他們要除的「國賊」，不是當時危害中國賣國殘民的北洋軍閥，而是領導當時國共合作的孫中山及共產黨。他們稱頌反革命的陳炯明的「聯省自治」，反對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孫中山在其革命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所指斥的國家主義派就是他們。他們的黨魁曾琦，在法國時寫過這樣兩句詩：「克雷蒙梭是吾師，樸恩凱萊更不疑。」克雷蒙梭與樸恩凱萊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十足代表其軍國主義的思想。他更特別稱讚「青年土耳其黨」的反共成績，所以該黨的外文名字原來就是「青年中國黨」。當時在法國的曾琦、李璜、何魯之之徒，每當華僑群眾集會時，總時大擺其紳士奧架子，不屑與中國工人及貧苦學生為伍；與當時在法國的貧困組織，恰成爲兩個階級的顯明對壘。曾琦等回國與左舜生、陳啓天、余家菊

等辦『醒獅』報時，公開站在陳炯明，趙恆惕反革命『聯省自治』方面，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成爲當時青年群眾所最反對的反動集團，大家都呼他們爲『獅子狗』。從此以後，青年黨就一直依附於各地軍閥。不論北方的吳佩孚、張作霖、閻錫山、孫傳芳，或是南方的陳炯明、劉湘等等，他們都賣身投靠過。『五卅』運動的時候，他們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公開走狗。在蔣介石反動統治建立之後，他們又採取兩面政策，一面以會琦等留在北方專門勾結反蔣的軍閥，另一方面左舜生却在南京充當蔣系政治學校的教官。所以，抗戰後左舜生在重慶高談『抗戰』，而會琦則跑到上海、南京去作漢奸，與梁鴻志詩酒唱和，想在汪精衛那裡謀得一官半職。後來左舜生在重慶高談『反蔣獨裁』，而李璜又在四川領取國民黨政府的津貼，甚至左舜生本人在同一時期也領取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特費』。由此可見他們的種種兩面政策是以反動爲主，以私人利害爲依歸的。當張學良部下的某青年黨員揭發青年黨勾結日寇時，會琦等的黨羽便立即加以暗殺。當國民黨極力分化民主同盟時，會琦、左舜生便首先領取津貼，出賣民盟。

青年黨這種賣友求榮、賣國媚外的卑鄙行爲，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們在近百年的歷史人物中，一向是崇拜會國藩、李鴻章、梁啟超，而鄙薄革命黨人的，左舜生特別稱讚李鴻章的賣國外交。在參政會上，左舜生會贊成汪精衛的『和平』主張。而現在爲左舜生所主持的『中華時報』，更公開主張親美帝國主義，青年黨中委而現爲蔣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常燕生，在該黨成都機關報『新中國日報』上寫文章，主張中國女人應該去做吉普女郎，以便吸收外國血統，據說這樣可以『強種強國』，其無恥的程度真是令人咋舌。

這一類反動的知識份子、漢奸、小官僚集團，其歷史從頭到尾都是醜惡無恥的。青年黨在整批的

實給國民黨後，便出現了另一個青年黨的中央委員會；這個新中央委員會的人物，固已承認會黨會（琦）左（舜生）李（璜）之命，參加過汪精衛的偽政府。這批新中央委員會的人物其背後是由國民黨的「復興系」支持着的；而會琦、左舜生、李璜等則由「CCC」及「政學系」支持着。兩個青年黨的鬭爭，同時又反映着「CCC」與「復興」的鬭爭。青年黨的這種醜態，與民社黨中鴻慈銘派之反對張君勱派可謂一槓一轡。

青年黨外史

陳永年

一 青年黨和北洋軍閥

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以前，當北洋軍閥橫行國內的時候，青年黨口頭上掛着「內除國賊」的招牌，實際上專事勾結國賊——北洋軍閥、南京孫傳芳軍閥、雲南唐繼堯軍閥等都是青年黨勾結的對象。青年黨在張作霖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王鎮撫、馮庸等，在孫傳芳方面有余家菊等，唐繼堯方面有張介石等。後來青年黨見孫傳芳的勢力快要被大革命浪潮衝毀的時候，乃命余家菊迅速與孫傳芳脫離關係，而余家菊竟回青年黨「與共存亡」（指與孫傳芳共存亡）四個字的電報。不過以後孫傳芳被殺死，而余家菊至今還活着。

二 青年黨與法西斯國家

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的浪潮進到長江流域，青年黨就退到北方奉系軍閥的羽翼之下。那時青年黨着着墨索里尼法西斯反革命在意大利奪得的勝利，一連出版了幾本「意大利法西斯蒂運動」與「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小冊子，並想派遣黨員張子柱做代表到意大利去與法西斯勾結。聽說後來到國外與德意法西斯國家取聯絡工作，這種壞先備，被人捷足先登的拿去了，青年黨望塵莫及、祇好瞞

業而已。

三 李大釗之死與青年黨

民國十六年夏季李大釗在北平被奉系軍閥逮捕以後，北平各報紙都以特號字登載李大釗乃是學者，大學教授，政治犯，不可傷害。而青年黨這時，陳啓天率領黨徒多人搗毀北平農報館，曾琦親自拜見奉系巨頭，謂李大釗乃共產黨唯一無二之首領，殺之共產黨勢力必消滅，機不可失，同時青年黨又假借北平民衆團體名義張貼標語，什麼「殺李大釗抵殺千萬個共產黨」什麼「殺以止殺」，……兩日後，李大釗等十數人遂被奉系軍閥絞死於天安門外。

四 青年黨與國民黨

自北洋軍閥被撲滅以後，青年黨失其憑依，黨員一個個像蒼蠅、蚊蟲落在大沙漠上一樣，快要殞死了。原來青年黨不但反對共產黨革命，就當國民黨北伐以前在廣東尙革命的時候，青年黨連國民黨也反對。後來國民黨的勢力到了長江，出賣革命取得北洋軍閥的地位，有官有勢有錢起來，青年黨正走頭無路的時候，又想回國民黨找新主顧。於是山左舜生走黃陂白陳布雷走蔣介石的路，以「以後青年黨不擴大組織，不發表反對國民黨的言論」爲交換條件，每月由蔣個人津貼青年黨四千五百元法幣。不久青年黨就在上海出版「國論」，「國論」就不像「醒獅週報」再有一篇反國民黨的言論了。後來黃陂白的「哀榮錄」上還有左舜生的一篇祭文，這篇文章的大意，左舜生以「大丈夫當磊磊落落，遇知己當顯其才能，不應當持着一黨的私見，……」的姿態出現，大有以管仲自比以鮑叔牙比黃陂

白，當時的齊桓公當然是指蔣介石了。聞『國論出版社』會養活不少青年黨份子，左舜生在黨內常以『青年黨中的蔣介石』自誇，會招青年黨一些份子的妬恨。

五 會慕韓與韓復榘

當韓復榘在山東得勢的時候，會琦又與這位將軍勾搭上了，那時『會琦』兩字的名片改用『會慕韓』三個字的名片了，（按會慕韓乃是會的別號，不過這時特印成『會慕韓』三個字的名片）。可是這位會慕韓倒差『名符其實』的真慕這位韓將軍，會大上韓將軍萬書前後不下四次，最後一次是在蘆溝橋事變以後，內容如何，迄今當然還有人知道，自二十七年韓復榘以通敵之罪伏誅，『會慕韓』三字的名片很快就又恢復爲『會琦』兩字了。

六 會琦與敵偽組織

趙毓松、李守黑雖是青年黨中的二三等脚色，可是趙毓松是會琦的私人書記，而李守黑則爲謝澄平所親近，因此趙李在青年黨中也漸覺有些重要，二十八年下半年趙毓松尙在成都任新中國日報總編輯。『八一三』後淞滬爲敵佔據謝澄平離滬赴港之第二日，李守黑即與謝妻在上海中振坊二十號實行同居，出入與共，儼若夫婦，不過謝澄平抵漢口後已另有新歡。趙毓松係二十九年春離開成都到北平，然後南下到南京的。聞趙毓松的父親係吳佩孚的舊屬，趙即以此關係由王克敏向南京敵偽組織推荐，但趙毓松到南京後與李守黑等十餘人以青年黨代表名義與汪逆進行談話。趙冒稱青年黨中委，並携有會琦李瑣信件，因此趙竟在敵偽組織中獲得農礦部長一職。所以當時一般傳說敵偽組織中有會琦

李璜其名。自此以後，會琦即寄居香港，與趙毓松時有密使往返。香港淪陷中，會琦即上了敵人的軍艦，隨着敵人的軍艦由港到滬後，會琦用「陳復光」名字與內地李璜等通信。自趙毓松以青年黨名義參加偽組織後，每月即由趙向敵偽財政部領若干黨費津貼，最初每月四萬元，後來增為十萬，最後改費十五萬元，而自會琦到上海後，這筆津貼遂由會琦領去了。會琦這次往來南京與上海前後三四年，雖沒做到官，可是得到一個很年青的日本夫人，介紹人即趙毓松，而證婚人即是南京偽組織司法院長溫道宗堯。現在會却向人聲明，證婚人溫某係女方所請的。

七 會琦——青年黨中的「汪精衛」

當會琦匿居上海，密與敵偽往返時，青年黨中少壯派份子有些大為不滿，姜祖剛、汪克永等表示尤烈，大罵「會琦乃青年黨中的汪精衛」。日本投降後，會琦在上海便躲着不敢露面，同時又暗裡托人向國民黨吊膀子。此時適國民黨與共產黨正在談判，而重慶「民主大同盟」鬧得異常激烈，頗與政府為敵。國民黨很想破壞「民盟」，乃由吳鐵城派人與會琦在上海接洽，結果，「以青年黨脫離「民盟」並以後青年黨與國民黨採取一致政見」為交換條件，每月由國民黨津貼青年黨月費一千元法幣。於「會琦才獲得起死回生之術，公開來到重慶，宣佈青年黨與民盟完全脫離關係，今後青年黨以單獨身份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果然青年黨在「政協」中大捧國民黨的場，新中國日報上標題「國民黨」與「共產黨」改為「國軍」與「共軍」了。從此會琦派的青年黨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尾巴，青年黨被人譏為「在野政府黨」了。後來蔣介石又親自下手諭，撥上海虹口某路大樓房一座交青年黨以為新中國日報使用。雖然如此，而青年黨內又鬧着新的內鬨，左舜生到上海後，揚言欲另辦

「中華時報」以別於新中國日報，李璜稱病不出，曾琦連忙來到成都托李璜說好在舞臺，但不知約單如何云。

(文萃四十五期)

青年黨的故事

吳 格

一 嚴肅的入黨儀式

當北伐還沒有成功的時候，青年黨同現代一樣巴心巴肝的擁護着當時的政府，他們抗着一面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跟着孫傳芳轉，跟着張作霖轉。他們把當時的五色旗，當成了他們的黨旗。

五色旗是他們的唯一不可侵犯的權威，他們歌頌着五色旗。記得魯迅生時不知怎樣「冒犯」了一下這個東西，結果惹得常燕生好生不快的紅着臉同魯迅吵了一架。

因為五色旗既然如此嚴重，所以一個剛入青年黨的，第一就得承認五色旗，向五色旗行三鞠躬；青年黨的入黨儀式也就僅是向五色旗行三鞠躬。

孫傳芳垮了，全部北洋軍閥都垮了，連張作霖都被日本炸死之後，同時又宣佈了不准再用五色旗。這樣一來，青年黨便像靈魂失去了依據似的，尤其是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同當時的國民政府取得諒解，所以他們很苦惱的一個問題，就是，用什麼給新收的黨徒膜拜呢？

就在這個時候，四川的青年黨解決了這個嚴重問題。當時四川還通行着一種「當二百文」的銅幣，那種銅幣是「一脚踏兩隻船」的一個四川軍閥發行的，他在那種銅幣上刻着兩支交叉着的旗子，一支是十二個角的代表北伐軍的旗，一支就是五色國旗了。

青年黨人聰明地利用了這銅幣，他們叫新入黨的黨徒向這種銅幣行禮。據一個現在已不甚熱中的青年黨徒對我說：當初舉行這種儀式時，還是一個人高舉着遮了半邊（代表北伐軍那邊）的銅板叫人向銅板行禮，後來不知怎樣，上面又來了一個命令，說可以向整個的銅元行禮了。

一一 意外的收穫

去年秋天，青年黨舉行了一次四川代表大會，會前沒有聽說有什麼準備，會後才由他們的機關報發佈了他們四川代表大會的若干大決定。因此，事後竟有人對於青年黨的秘密性發生了奇異的崇拜。其實呢，會前連青年黨自身也不曉得要開一個代表會，也許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因為這個代表大會實在是一個奇蹟，也是意外的收穫。

「九一八」那些年代，有一個川大附高中的姓陳的青年黨學生黨員，因畢業之後無事可作，便回到了遂安原籍，暫時在本地當小學教員，因為陳究竟是一個頗為熱情的青年，所以同他交往的本地青年也不少，不過那時的交往也僅是一種普通的交往而已，一直到「七七」抗日戰爭爆發了，青年們本身覺得應有一種組織才對。有這種感覺的人，自然陳也是其中的一個，但陳當時已與青年黨的關係中斷了，而且自己也不大熱心於黨，於是青年們僅僅組成了一些讀書會，自治會之類的東西。

這種山青年自覺自動的組織延長寬了，也根深蒂固了，可是他們的目的却只不過如何在地方上爭位置。截至去年上半年，這種有組織的青年，幾乎包攬完了全遂安的小學校和地方行政工作。

正當遂安的青年們活躍的時候，青年黨籍的陳，偶然知道了青年黨的機關報已由武漢搬到了成都，換言之，他已經曉得青年黨是可以稍微公開一點的活動了。陳爲了要在地方青年中爭領導權，在

民國二十九年，陳公開了他是青年黨。他把青年黨那一套道理移植進那些純潔青年的腦子裡了，於是蓬安便成了一個青年黨的窩。雖然如此，但蓬安的青年黨是與成都青年黨沒有連繫的，成都的青年黨不曉得蓬安也有青年黨，蓬安的青年黨因為沒那個需要，也就不肯專程到成都來聯絡。

這樣繼續了幾年，去年夏，蓬安成立正式參議會，議員要經過民選，這樣，當然青年黨的黨徒也參加了競選，選舉的結果，因為地方基層人員多是青年黨，所以選出來的縣參議員除了有一位是國民黨部的書記長而外，其餘多屬青年黨。議員選出了以後，緊接着由議員互選議長。誰該當議長呢？以議員的成份來看，當然應該是青年黨人，可是後來居然不是的。青年黨的議員們不懂得怎樣當議長，所以結果是青年黨同國民黨交涉：議長讓國民黨的人當，交換的條件，是國民黨負責把縣中校長交予青年黨。

生意成交以後，青年黨的人覺得自己太吃虧了，可是又怪不得誰，討論了一陣，才恍然大悟到吃虧在與黨的上級機關沒有聯繫。同時又聽說李璜等正在成都，於是便決定派人到成都來接頭。他們到新中國日報來把蓬安的情況報告了一番，跟着又告訴了李璜。李璜驚訝了，他在那幾天裡公然說：我們簡直可以號稱有黨員一百萬。跟即，聰明的李璜便決定不如乘機來一次四川代表會，把各縣的黨務整理一下，所以當即向蓬安的來人說：『我們早就決定了短期之內開全省代表大會的，你來得甚好。』全省代表大會開了兩天，到的代表除了蓬安的而外，大多為成都黨員臨時帶了一個什麼縣的牌子，來解了解嘲，當時決定了由省黨部派員到各縣去實地考察並整理黨務，推出的人是一個在成都風頭甚健的省委。

後來果然這位考察人到各縣走了一遭，帶回來的成績就是替新中國日報推銷了幾百份。

三 雙柑園裡的「鬼」

說起雙柑園來，誰也曉得那是一個常常在報上出現的地名，不信且翻一翻新中國日報或者「狂」半月刊，或者「青年世界」之類的刊物，便可看見雙柑園這幾個赫然比刊頭還大的字。

雙柑園是青年黨姜蘊剛的住宅，姜蘊剛是華西大學哲學系的主任，在姜所主持的華大哲學系裡的學生，不少都是入了姜的彀的，他把這一群青年從學校引到他的住宅。在那個住宅裡的兩株柑樹下，姜第一個吹的就是尼采和叔本華。前年起，他又把超人哲學「發展」成爲「新浪漫主義」，他說新浪漫主義就是「新野蠻主義」，這樣演繹下來，便是「意志才是最高的境界」。也即是說你高興做什麼便做什麼；於是狂飆社成立了，八九十個狂飆人物可真的就像瘋狂了似的，他們在雙柑園裡漫無邊際的談着哲學，談着中國是該如何走向帝國的道路，甚至於談着鬼。鬼，確實是一個逗人愛聽的問題，於是雙柑園便發行了一種名叫「鬼」的半月刊，「鬼」半月刊的創刊號，最重要的一篇就是「雙柑園談鬼」。那篇文章的主題，就是在說明：把鬼當做一個問題來討論，就是一件新的浪漫作風，這篇文章的作法同前年他們主張中國人都該學跳舞是一樣的。

「鬼」發行出來了，如今是三期，這三期的封面，沒有一次不是畫的妖魔鬼怪，至於裡面所登載的呢，當然也就是說：某處發現了一個大頭鬼，某處又是如何有一個漂亮女鬼纏住了一個少年學生，諸如此類的助長麻痺的東西，是他們最需要的材料。所以這個「新野蠻」作風，竟然也一度被中小學生們感到了興趣，「鬼」於是在成都的所有期刊裡居然爭到了第一個暢銷的地位，其數量至少可以說是青年黨所有機關報中最多的一家。

四 兩個失意的人物

說起來，青年黨在現在這個正是得寵的時候，是不應該有人感覺失意的。可是事情就巧在這兒，恰巧在這個家人都在得意時，領袖李璜却孤獨起來了。

青年黨一向採的是多邊政策，這事連他們自己也不會否認過。實行的方法就是幾個領袖分頭去搞。抗戰時期，會琦走汪精衛的路，李璜則一面與政府周旋，一面又與民主派勾勾搭搭，這樣一來，李璜在四川很得勢，反過來就是會琦在四川沒有被人提起過一次。當李璜得勢之時，接近李璜的楊叔明，劉東岩等人都是李的好幹部，李的腰伸得挺直。憑了他的眼光究竟比會琦高明點，所以他把民主提得高一點。可是抗戰勝利了，勝利後的中國要打內戰，會琦在反共方面比李璜有用得多，當局賞識了會琦，會琦被賞識的事小，可憐的是李所認為是接近的人也拋了他而去投奔會。這時的李，氣可真的有些氣了，但還以為可以再回成都來練一練，也許四川的小黨員還會擁戴，誰想他回到成都來的時候，四川的中級幹部早把他擲了。四川黨員除開一部乾脆去到會琦那邊去了的而外，黨內的革新運動起來了。姜蘊剛，魏時珍他們自己搞了一個小組織，公開說：「我們不來官僚那一套。李璜垮了，垮後的李璜曾經在李聞追悼會上發表過一番滿是牢騷的演說，他說：『李聞兩先生為民主奮鬥而死了，還落得一個『民主烈士』的美名，但我們幹了二十多年，却又有什麼呢？……』說至此，兩眼流淚，兩手捶胸。

此外，還有一個是不大知名人物，叫做吳肇海。此人雖不出名，却也是青年黨的創始人。據吳本人表示：「我不是這一起青年黨，我是真正的青年黨。」可是對於這個人，青年黨既不否認他，也沒

有把他當成一個創始人看待。最近吳佩孚也在成都出現，但他每到成都來一次，總要找幾個認識的人來談談青年黨，他一談起青年黨來就是罵，記得有一次他這樣說：會琦李璜曾經罵過汪精衛是某老總的小老婆，其實呢？會琦却是某老總的上炕老媽兒，這個上炕老媽兒被老希用了之後，僅僅替他縫了一件毛藍布襖子，這樣就受寵若驚的到處說：老爺多愛他。

(摘自文萃第二卷第一期)

青年黨爭權奪利內鬩記

蔣介石「八、一四」文告發表後，青年黨代表會琦與劉東岩兩氏即飛往牯嶺，正當會劉抵達牯嶺時，南京各機關團體突然接到中國青年黨中央委員會的公函和宣言。

據所謂青年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蘭道濟說：「在抗戰中，青年黨有兩個目標，一爲抗日，一爲民主。自民國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一年止，這是青年黨統一建立時期，三十二年以後，是黨章整理時期。去年十二月，曾琦、左舜生、陳啓天參加全國代表大會，交涉青年黨國大代表的產生，這中間的名額分配有問題，所以在七月七日，青年黨第四屆全國幹部會議舉行時，以二十餘省市單位代表四十三人，決議成立中央委員會，選出委員長，和二十八個委員。」

對委員名單中沒有一個青年黨名人，周說：「關於這點，不必驚異，正因爲如此，它象徵了青年黨內部有兩種團體，它在作法上起了分裂，會左陳他們是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而這是中央委員會，該會的產生，是在今年七、七的幹部會議。該會一無政治背景，二無任何經濟支援，並且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目標已經有宣言公佈世人。」

宣言有八大綱領，語多空洞抽象之詞，但宣言中最重要最中心的意欲，爲在第七項和結論中所提出者。第七項是這樣說的：「倘有某黨分子貌似君子，實小人，外求民主，內行獨裁……冒用多數人名義僭行少數人之自私，向政府推荐代表，務必擯除之。……堅決反對此種腐化份子充任國大

代表，各人主張本黨參加國大之代表，必須本黨黨員公開選出，庶乎不違反黨員之意志。……「真言的結論中又指出：『吾人對本黨黨務之處理，反對獨裁壟斷，寡頭操縱，主張採用民主方式，……不應少數人獨負維艱。』」

當宣言散佈出去後，陳啓天、左舜生在上海對此事即加以解釋，陳說：『青年黨在滬不在京，至於函內所述七七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名單，並無所悉。至名單所列人名，是否為青年黨員，現已記不清楚。』左說：『發表該項宣言之所謂青年黨委員，一部份已開除黨籍，他們完全是胡鬧。』

這一場風波尙未平息，從廬山之巔傳來政府改組的消息，且傳教部將由青年黨來主持，曾琦對於此事，週旋甚力云。

這一條消息傳來南京以後，南京青年黨「中央委員會」立即定十八日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青年黨內情。曾琦、劉東岩在牯嶺聞訊之餘，非常焦急，憂心忡忡，於七日發加急專電，請在南京的第三者代為制止周道濟招待記者，聞電內並稱，「周道濟等為附逆份子，早由該黨中央開除黨籍。」

然而十八日記者招待會並未被制止而作罷。周道濟穿着嶄新的西服，以豐美的茶點招待中外三十幾位記者，他見記者時說：『今天請諸位來看戲，看青年黨的戲。』以後，他作了一個簡短的報告，計分四點：一，青年黨近來主持者獨裁，缺少民主作風，違背黨章。二，現該黨發起革新運動。三，並非為爭取國大代表名額。四，至左、陳在滬稱已開除周等之黨籍，此為胡鬧與開玩笑，因新中央委員會擁有人數佔該黨五分之三至四，新中央委員會亦可開除左等之黨籍。周最後強調提出：在抗戰時

期，渠曾努力於江南之「地下工作」，與當時隱身於東滬之間的會黨聯絡甚密。周從未去重慶，去年該黨在渝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周等以交通阻塞，未得出席以獲取黨代表之資格。周稱：該代表大會之結果，爲此次分裂之最大原因。

以上這一微妙的新聞，從頭到尾，足以聯成一幕喜劇。自會劉兩氏飛牯嶺之日，周等即演出「扯腿」的把戲，發出宣言，渲染該黨內主持份子的獨裁，而陳啓天在滬說：「名單所列人名，現已記不清楚」，左舜生則說：「他們完全是胡鬧，一部份已被開除黨籍。」接着是青年黨在政府改組聲中將主持教育部，這時，周乃決定舉行記者招待會，而會劉兩人則在牯嶺憂心忡忡，急電制止，並稱周爲附逆份子。周則聲稱中央委員會擁有五分之三至四的黨魁，亦可開除左等之黨籍，並且稱爲「地下工作者」。這一幕黨爭的醜態，是使聞者發嘔。不管他們是「憂心忡忡」或者是「反對獨裁」，他們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讀者大概可以很明白了吧！

（摘自「民主報」）

青年黨的眞面貌

史敬棠

一 國家主義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

青年黨在抗戰前抗戰後所提倡宣傳的國家主義真實內容究竟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還在大革命時期蕭楚女寫的「顯微鏡下之醒獅派」一文中，有一段精闢的透見，認為青年黨當時所主張的國家主義內容，實際上就是反對打倒帝國主義，又對取消不平等條約：

「醒獅派（按即指青年黨）底唯一口號，是『外抗強權』。但『醒獅』第十八期上却說：『在革命期中，我們對於外國一切之既成條約，均照舊遵守，俟實力充足之後，再來收回一切主權，取消不平等條約。』原來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國信』一樣的。『照舊遵守一切既成條約』——這便是醒獅派『大無畏』的外抗強權！十八期『醒獅』上文說：『我們現在即行反對帝國主義，我們能不能與外國言戰？我們實力未充足之前，我們即行如是，我們有得勝的希望沒有？』原來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與『打倒帝國主義』的方法不同的，他們雖抗，却不致於像打倒帝國主義者那樣要弄得與外國言戰的。原來凡『說打倒帝國主義，那也就須與外國言戰』——若不與外國言戰，就不能算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原來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只說着玩而不實行的，因為他認為現在還是應當遵守一切既成條約的時代。」

抗戰以後，其宣傳內容，極力推崇歷史上對外主和對內用武的人物，如說：『中國自南宋理學大

盛以後，士大夫的議論就習爲虛驕，不顧事實，宋高宗的和議，就受盡了當時以及後世正人君子的斥罵，明毅宗因此對滿洲主戰到底，袁崇煥至以對滿休戰被疑而死。假使當時朝廷不重虛驕的意氣，肯採用袁崇煥的計劃，對滿洲暫行罷兵，而以全力削平國內流寇之亂，何致有後來的潰敗而不可收拾？清末的情勢更不相同，當時西洋各國對中國本無領土主權侵略的野心，所志不過在通商貿易，如果應得當，不難兩利並存，乃以士大夫的虛驕之氣甚重，洞明時勢者如郭崇燾一流，俱以談洋務被斥爲漢奸，以致不該戰而戰，該和而和，國家吃盡了大虧。」（常燕生：『林則徐論』，新中國日報三十四年六月三日）同一作者又提出樹立歷史上的『和親』政策——又名『吉普女郎』政策，奉獻出自己的妻女，以取得帝國主義的歡心，真是一幅奴顏媚骨，原文如下：『由於古代中國政治家及一般人的胸襟遠大，老早就積極運用吉普女郎的政策，而收到了奇效，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能禦四夷，開疆拓土，大部份是由於古代中國政治家的善於運用吉普女郎政策，古代中國婦女對於國家民族生存獨立的貢獻，莫有過於這一般吉普女郎者。現代的吉普女郎運動，我們叫做『國際聯歡』，在古代這一種運動便稱之爲『和親』。『她們對於祖國功績，比起張騫、班超、薛仁貴、王女等一類的男傑來，毫無遜色、歷史上第一個有名的吉普女郎，是西漢的楚王戍之女解憂，第二個歷史上有名的吉普女郎是西漢末的王昭君，第三個歷史上有名的吉普女郎是唐朝的文成公主。』『今天中國如有漢武帝、唐太宗那樣偉大的政治家，我以為應該樹立一個積極的吉普女郎政策，這政策對國家的益處很多。從抗戰觀點來看，不久盟軍就會大量在中國登陸，以我們中國物資缺乏，生活簡陋，我們拿什麼來慰勞這些戰士，來鼓勵他們的鬪志？『食色性也』，古今中外人所同具，我們沒有食，便得用到色的，美軍還嫌不夠，我想偌大帝國也不見得就因此貶損了國格。……我們天天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難到性的問題的時候，却一變而為貞節至上，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置之腦後了，這種民族主義的道德觀，現在應該修改一點了吧！」（常燕生：『向吉普女郎致敬』，新中國日報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最後作者竟發表了最可恥的謬論否定了有數千年歷史的偉大中華民族，主張以美國人的血統來改造中國人，它是這樣寫着的：「從民族血統的觀點看來，一個民族的興盛，全看他的民族經過幾次混血，歷史上的混血兒是民族的寶貝，中國歷史上的晉文公、唐太宗、鄭成功都是混血兒的代表。五胡亂華之後，中國經過民族上的大混合，才有隋唐的中興。中國民族今天在血統上必須經過混合，注入新鮮的血液，才能起衰老而復少壯。……假如將來在中國有三百萬個盟軍，每一個盟軍配以一個吉普女郎，每一個吉普女郎替中國產生一混血兒，二十年後中國不但平添了三百萬的丁男丁女，還大部份都是體格及智力最優秀的，這個利益大不大？」（常燕生：『向吉普女郎致敬』，新中國日報三十四年六月四日）這些就是青年黨國家主義的典型內容。

一一 對抗戰主張投降，組織漢奸政府。

在抗戰初期，青年黨對抗戰的主張，還不敢冒然提出反對抗戰，却把抗戰分為『應該打』與『不能打』。在二十九年九月六日新中國日報特載『抗戰的認識』中說道：『會憶當淪戰初起時，友人某君問我：『你看這次抗戰對不對？』我當時會本我一往信心慨然答之曰：『應該打！打是沒有錯的！』不過先要明白應該打，與能不能打的意思完全兩樣。能打不一定應該打，而應該打，並不一定能。所以我只說應該打，並不說能不能打。』迨至武漢失守以後，全國妥協空氣甚囂塵上，青年黨人正在此時大加讚揚法國維希政府，職員當為忍辱貶節，其用心實可想見了。『今後法國之國運將如

何？曰，以貝當政府成立以後之種種舉措卜之，法國已有復興之氣象，其前途仍光明無限，不可認此一蹶遂弗振也。何則？國患不在戰敗，而患在內亂，內潰，以至於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法國之不能再戰，乃係事實。……不能再戰而毅然決然忍辱爲城下之盟，雖謂天下之大不韙而甘爲之，此貝當以八十老翁出而支持殘破局面之心理也。——今日之貝當，卽昔日德國之興登堡也，八十老翁復何所求而忍辱貶節以至於此，豈非胸中別有更善之計劃而爲國人所共諒乎。自貝當柄國以來，法國內政，次第刷新，……凡此種種，皆德之所以致復興之遺，而法國今則一一效之，謂非其力圖發憤自強可乎。若謂維希政府一味降敵賣國，其種種設施不外獻媚強敵，摧殘異己……殆於此等事實未嘗注意也。

「常燕生：『國勢，國策，國運』，二十九年八月八日新中國日報專載）更進言當局。效法法奸貝當組織維希政府，不必計流言，怕人唾罵：『國家勝敗興亡，本無一定準則，惟政府及人民均當有最高之愛國忠忱，方能完成其主觀條件之重要基礎。……假使客觀環境有隨時轉爲良好之傾向，而其國人及政府均置國家利益於第二位，而先爲私家之自謀，其國必終至於滅亡無疑，卽使非自私自利，而欲圖卸一己受唾罵之責，而寧使國家民族先受其害，亦屬謀國不忠。凡眞誠愛國者，不僅外自己之私利，並當外自己之名譽。王莽與周公，始也並無何等不同，而其結果乃有天淵之別，故古人有詩云：『假使一朝身先死；一生忠僞有誰知？』殆有慨乎爲國之居心，究不必計流言，而重在其結果也。……果使貝當爲效第一次歐戰時之興登堡，則將來容許在法國史上爲一可歌可泣之人。」（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三 政治上的主張『官治』與『紳治』

青年黨人政治上的主張，只認可少數人統治的政治，真正之民主政府在任何時代是不會有。姜繼剛在他的『戰後新世界』一文裡，就是這樣講的：『在我看起來，任何時代，任何政治形體，真實上就不能成爲多數人統治的政治，可是一個人統治的政治也還不易看見，君主專制及獨裁等一人的政治，大都還是少數人協助或共同行動的政治，古之所謂賢君，萬不可少的還是良臣賢相，真正的一個人的統治政治，幾乎不易尋覓，尤其是昏暴的專制獨裁者，更需要的是官者之流或爪牙之輩。再談多數人共同統治的政府，只有推理與想像中可以發生，究諸實相，還是由少數人主持。這少數人統治的政治，雖不稱之爲貴族或寡頭，但貴族或寡頭的政治是時時存在着的，——君主專制，獨裁或立憲、民主、暴民等團體，固然時在迅速的變形，但貴族的或寡頭的政治是始終一貫的潛存在裡邊。——事實上，既無絕對之真正獨裁，更不會有真正之民主。』（新中國日報三十一年六月八日）隨後新中國日報社論，大談其『官治』與『紳治』：『官治與紳治本身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官如得其人，則官治運用較爲便利，效率較強，官如不能發揮官僚政治的優點而徒暴露其弱點，則尙不如多數紳士協議而治可以收互相補益之效，紳士固然未必盡屬好人，但既屬人多，則凡事必須協商，不能由任何人壟斷，可減少許多流弊，不過效率較低耳。』『權集於一人則爲官治，權分於一部份人則爲紳治，一人獨尊，則不平而窺伺者多，亂亦多；衆人分權，則四民之魁桀者，有所伸布，不平之氣少而敵亦少。此官紳二治優劣之大較也。』『或曰，子胥官治，言紳治，獨不言民治，無乃過於時代落伍乎？應之曰：嗚乎，自有人類以來，所謂大多數民者，蓋無時不爲貓脚爪也，或供官之驅使，或供紳

之利用而已——」(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所謂「官治」「紳治」，實質即是封建專制獨裁的別名，雖然青年黨人中亦有少數人，曾在抗戰勝利前一個短時期打起過民主的招牌，但自抗戰勝利後，連這塊假民主的招牌也不要了。既在政治上主張專制獨裁，就必然在思想上要提倡愚忠，絕對服從領袖一套理論：「領袖之最高裁決權，其存在之理由，有相對絕對兩義。」「所謂絕對之義，即：問最高裁決之內容如何，只須其確為領袖之裁決，即不問理由而凜然一行之。」「所謂忠之絕對義者，即不得以理論上之是非，事實上之利害，搖動忠實奉行領袖命令之意志之謂也。世有以功利的見解，反對忠之絕對義而目岳武穆為愚忠者，皆淺陋之見也。」(重慶版「國論」第十二號)

四 經濟上的主張——反對耕者有其田，反對二五減租。

經濟問題上，青年黨總的看法，否認有剝削的事實存在，「中國今日社會普遍的窮困，並不由於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國論」第二卷八期)經濟問題中的一個最重大的土地問題，青年黨所採取的態度，是反對耕者有其田，主張土地兼併的：「現在感覺土地兼併的人，有的義憤填膺，主張沒收地主土地，而立基其主張於耕者有其田的『遺教』……。」

無如政策不可感情用事何？說到「遺教」，「耕者有其田」，亦有種種解釋之可能。一種是「唯耕者得有其田」，另一種是「凡耕者可有其田」。前一種說法，是不許耕者以外的人保有國地，即不許田地成為投資的對象，即不許田地成為買賣品，亦即不許土地成為國民儲蓄的寄托所。後一種說法，是扶助自耕農使其得以獲得土地，並不主張取消土地私有制度。我們非國民黨員，不具解釋「遺教

「的權利，但是總覺得『遺教』的本意是常用第二說去解釋的。果然，則用『耕者有其田』之說，以主張沒收地主土地的人，確實是混冒『遺教』，其事可惡，其心可鄙。——至於限制購田額，姑不問違反經營上的經濟原則，試問此項限額依生產者自身之消費需要而規定之乎？抑依生產者耕種能力之限度而規定之乎？言需要，則一切可自產而無須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乎？言能力，則只許因體力，或獸力，不許用機器力乎？如何規定？」（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他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而且也反對二五減租：「今日盛行二五減租，此一標準之樹立，不知係何所根據，根據於佃農生活之必要乎？根據於佃農勞動報酬上之正當乎？根據於地主合法利潤之應當縮減乎？」「如果採取經濟的立場，便當問佃農的勞力報酬，應佔全部收入中百分之若干？今日所出租額，究高於此數，抑低於此數，若高於此數，地主所入多，而地價必漲，若低於此數，則佃農所入必高，而佃權競爭必烈。地價太高，則穀價必低，工價亦隨之而高。……若地主所入過低，則國民經營農業者必概為力能自耕之人，於是而產權競爭疲滯，而地價必低，農業的改良亦心緩慢，因具有改良能力以及經營能力之人，其多數必不能自耕，至少亦不止於自耕。所以為發展全盤的農業經濟起見。應當給與地主的合理的利潤。」（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新中國日報」）

五 反蘇反共歌頌法西斯

青年黨反蘇反共的言論，屢見不鮮，從未放鬆過。侮謫蘇聯爲暴虐的政府：「事實上斯大林政府仍然是一個極端暴虐的獨裁政府，就拿屠殺反政府派領袖一事看來，連法西斯國家也不能再比他們暴虐。」（『國論』第二卷八期）其反蘇論調，甚至連一個起碼普通社會科學常識都忘記掉了，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看成一體，青年黨領袖之一常燕生說：「我以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別的，實際就是高度的資本主義……」（『關於新戰國時代』。『國論』第四期）在不久以前一次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發動反蘇運動，青年黨復在旁搖旗吶喊，提出對蘇外交須以武力爲後盾，甚至不惜出於一戰：「蘇聯猙獰的面目，國人已有親切之認識；我們始終認定未來世界的和平，必須以武力爲後盾。」（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在反共問題上，青年黨完全公開成爲國民黨的附庸，與國民黨一鼻孔出氣，如在國共兩黨談判之際，隨聲附和，亦跟着國民黨強調軍隊國家化，要中共交出全部武裝。對國民黨政府承認共產黨有十二個師，認爲這種作法，「實在失去了政府的尊嚴和體統。」並且又繼續說：「我們更要知道今天不是中共有軍隊，好多地方軍人，也有不少軍隊，那國民黨政府也要一一的和他們講價錢嗎？試想這樣的中國，將會成爲什麼樣子。」（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新中國日報』）其對中共仇視之深，甚至遠在抗戰初期，二十七年青年黨九次大會上即有人提出與日共同防共的主張：「倘能在領土與主權完整的原則下與日訂立防共協定，即暫時議和，亦未始非解決時局之辦法。」相反地，對納粹法西斯却非常親切，爲之辯護，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政權，世人早已公認爲獨裁專制，可是青年黨人却說與英美法等民主議會政治並無有本質的不同：「

現代法西斯時代，義國、意大利和德意志，他們領袖之取得政權，都是由多數民衆的擁護而來的，即在
今日兩國之中也並未取消議會，並且每有大舉必訴之於國民的總投票，希特勒尤其善於利用此點。
『甚至即最標準的民主國家如英法美三國，當選舉投票的時候，威迫或者可至，而利誘不也是照樣發
生，不過僅有程度之差異嗎？如果我們把這些事實上的曲綫擱過暫時不提，單就理論方面來看，我們也
不能發現法西斯主義是根本否認民主政治的。』（『國論』第二卷八期）對希特勒的野蠻侵略行爲，
則更是歌頌備至：『就希特勒的個性來說，他可以說是集俾斯麥的鐵血手腕、尼采的超人哲學及華格納
的歌劇於一身的。他底演說的天才、煽動群衆的魔力，暴風雨般的行動，簡直就是華格納樂曲的副本
，充分地滲雜着英雄、神秘、熱情、叫囂的氛圍，而他早年的失意、孤獨，戰敗後德國地位之低落、
貧困，更在他底潛意識裡結晶了瘋狂的怨毒種子。所以當希特勒這次發動二次大戰的初期，德國有那樣
迅速驚人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蘇軾有言：『用兵常用其翻然勃然之氣』，希特勒算是充分地運
用了這種『翻然勃然之氣』了。（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綜合上述青年黨的言論主張，告訴我們：它是依附國外帝國主義，國內封建軍閥，在政治上主張
專制獨裁，反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一個半殖民地封建法西斯集團。青年黨這個封建法西斯集
團與國民黨內部的法西斯集團兩者的合流，是無足奇怪的，中國有一句老話：『物以類聚』，就是這
個道理。

（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

「中和黨」如此這般

林 南

本月之初，中和黨副世襲主席尤永昌，率領了部長等人，浩浩蕩蕩一行，晉京活動，要求分配「國大」代表名額，並準備向「國大」呈獻「家傳國璽」，並在上海舉行過一次記者招待會，以廣宣傳云云。

話說中和黨裡有個女「黨魁」，二十來歲，粉面紅唇，梳個西式男鬚，也是油光鑒人。在那天記者招待會上，捧茶遞煙，頗形忙碌，尤見「活潑」。逢人頰解：「我們這次招待記者……」「我在組織部幹點事」，等等。並且一再背誦履歷，隱隱，出身什麼「幹訓團」，到過前綫大後方，帶過某某女生隊，……大有爲抗戰盡瘁八年的樣子。她似乎頗懂拉攏新聞記者之道，跟幾個女記者攪得甚爲熟絡，互道「了不起」。但聽她們談得十分起勁：

「是的，我是國民黨裡的。」那女「黨魁」談得紅光滿面，說溜了嘴收不住。見對方略有驚訝色，就不慌不忙地補充說：

「噢，這個完全沒有關係，中和黨跟國民黨宗旨完全一樣，目的完全一樣，只有一點的不同，所以，完全沒有關係……我十七歲參加三青團，而團員跟黨也是完全一樣的。」

偶或對方主動地發一些問題，「黨魁」却也能不太聰明地掩飾其尷尬之態。

「吧，我們的黨員嗎？那多得，多得，多得，全國各地都有，上海好像就有二十多個人，這個上面

有（指招待席上分贈之二份資料，按其中號稱全國黨員二百萬或二百五十萬不等），這個上面有

問及黨史，「黨魁」答道：

「呃，大概有六十幾年了……總之比國民黨還早，我倒不怎麼清楚……總部嗎？恐怕就要在上海了。現在嗎？……大概在廣州……呃，對了，是在吉隆坡。這兩份東西上面都有，統統有。」

不知是那些記者撩得無聊了，隨便找些問題，還是存心問得苛刻，終於，問起了她的「黨壽」還下，她支吾了：

「噢，不久，還不久，我還只進去幫了兩個月忙，在組織部幫忙……是的，我還沒有入黨，還沒有正式入黨。」

至此，那位「幫了兩個月忙的女黨魁」，就不復使大家發生興趣了。聽說她的大名是：孫淑萍。另一位也正好看不過那女「黨魁」獨自出風頭，搭訕着過來把女的叫過一旁，悄聲叮囑她不要隨便講話，就繼承了她的座位。那人姓陳，首先分了一通卡片，其上印有「中和黨中央執行委員」，以及「吉隆坡民國日報」的什麼，和「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的什麼。還下，大小可總是一個真「黨魁」了。

陳「中委」首先談報，他說：「民國日報是我們兩黨同志合辦的，可以說是我們兩黨的機關報」。原來陳「中委」是民國十三年同時參加國民、中和兩黨的，並且自稱是國民黨的「常務委員」。

自然，他也繼承了「女黨魁」的「吹」的作風，說：「我們的報着重政治性，可謂馬來亞第二大

報。第一大報是胡文虎的星洲日報。『接着又補充說：還有一個『國父手創的新橫日報，資格最老，也可算是第一大報。』

對於不免要問問此第二大報係何時創刊，銷數如何等等，陳『中委』的答覆妙得令人絕倒，他說：『大概明年四月，也許可以出版。』

自此，陳『中委』便也備口開河起來了。打着滿紙的簡且藍青錫要命的官話，既數述自己的『英勇歷史』，如何從事地下工作，如何遭捕，如何被關四十天，如何被灌水三次，再用皮靴把水從肚皮裡踏出來，又如何給鑲落三顆牙齒……等等之類，同時又謙遜地記憶着今日的頭銜：音樂會長，國語學會會長等。接着，他便大談黨事：

『是呀，本黨的重要首腦的人物，都是黨國要人（此黨係指國民黨）。我們的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等等，都是國民黨員。而且同時，黨國要人裡頭，也有大部是出身中和黨的，像鄒魯，那個中大校長就說過：『我是中和黨出身的，不信你去看看出版社的回顧錄。』』

他還指指點點地翻着那兩份資料忙於吹噓，可惜招待開始，發言人在上席講話了。且聊誌其片斷於次：

『……本黨是個教育黨，蓋中國人心太危，非發揚孔教，講求忠恕之道，中國不能有希望。民族主義已成功，不平等條約已取消，然而民生主義尙不可見，故根本問題在此。……至民權主義，厥為實現民主政治，然而我國為文盲國家，選舉票也不會寫，那有什麼民主可談！即有也是包辦民主，文盲不掃除，民主是空話，因此本黨力主發揚孔教，以免垂危民族。……』

頻語間稱『先總理』，初聞之，易誤為指孫中山，實言其『主席』尤永昌之老子：『懸壺行醫』

之有列氏也。即席有二黨報採訪主任，提出問題，宣傳部長起立回答說：

「國大召開，本黨理應參加，以資成此一國家根本大法之集議大典。但是動黨那所謂『政協』所限制……。」所謂「二字，重複三遍之多，言下大有不勝揮霍之感。

（上海『評論報』第八期）

「孫科原形畢露」

——新華社時評——

所謂國民政府副主席的孫科，在本月二十二日發表談話，對外仇蘇、對內仇共。他居然把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停戰令、推翻政協路綫、造成國內分裂的事實，歸罪於「蘇聯不能使美國在中國的努力成功」，並且公然把「國當作美國的家產說：『美國反響冷淡，即等於對國放棄。』」他甚至撒嬌耍賴的說：『如果那樣，是在中國之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意思是：倘你再不疼我這個兒子，我就要認旁人做乾老子了。對於恢復國內和平問題，他把國民黨政府的兇惡面貌也表現得再分明沒有：『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

從政治協商會議以後，孫科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切倒行逆施從未表示過異議，他不但參加了遠法的分裂的所謂「國民大會」，而且參加了所謂「政府改組」。總算蒙蔣介石賜了根肉骨頭，當國民黨日暮途窮也是孫科日暮途窮的時候，得了個副主席的稱號。這些本來已够暴露他的原形了，但是不餓人的歷史却要迫使他更進一步，要把向來的什麼「自由主義」呀，「聯蘇聯共」呀，這一塊遮羞布通通剝光，來做裸體跳舞。孫科的醜態表示蔣介石小朝廷已經着了火，而在睡夢中驚醒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的人，常常是顧不得穿褲子的。

在中國國民黨的一切官僚之中，孫科是最爲寡廉鮮恥、反覆無常的丑角。他是孫中山先生的不孝子，孫先生逝世不久，他就背叛他父親的遺囑，參加極右翼的西山會議派。大革命中他又投入左派的武漢政府，然後他又到南京尋求一官半職。聯蔣倒蔣，載沈載浮。貶入立法院後，似乎「左傾」了，却又主持製訂了臭名昭著的「五五獨裁憲草」。抗戰期間，被蔣介石集團擠得沒有出路的時候，又表示向左，並戴着親蘇的面具訪問了一趟蘇聯。一九四一年蔣介石僅僅稍微收買他一下，他立即在香港大罵中共與民主政團同盟（民主同盟的前身，當時還包括青年黨與國社黨在內）。一九四二年一月，正當美國對日軍事不利，他奉蔣介石之命發表了著名的「對日單獨媾和」的談話，其目的與今天相同，就是向美國勒索五萬萬元的借款。以後他又失寵了，於是又成爲所謂「國民黨左派」，直到去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孫行者有七十二變，孫科的變化細算起來也不下此數，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是惟利是圖。他以後當然還會變，但再要欺騙群眾是難了；群眾不需要這樣的騙子，也不允許騙子們永遠騎在人民的頭上爭權逐利。孫科及其同類只有一個前途，叫做：樹倒猢猻散。孫科這次所以狂呼救命，正是爲了逃脫這個前途；但是，他將達不到自己的目的。

孫科和整個蔣介石王朝自從人民解放軍在廣泛地區舉行反攻以來，就一直忙於製造各種事件和謠言來反對蘇聯。這是爲什麼呢？還有一個次要的國內目的還有一個主要的國外目的。在國內，這個小朝廷想要轉移人民反內戰、反飢餓、反暴行運動的視線，但這只是次要的，因爲人民早已對南京的宣傳喪失信任。中央社說是黑，事實一定是白，這從他人民運動的各種污蔑就可以看清楚了。事實上，人民對於小朝廷的叫囂也是極端冷漠，學生們繼續反暴行的鬥爭，飢餓的人們也繼續搶米。此外，這個小朝廷還想爭取國內一部份基本上依靠宅但又唧唧噥噥的人們，但是很明顯的，這一部份人即使得

止唧唧嘍嘍，跟着黨部發個把「反蘇討共」的通電，也並不說挽救南京王朝的淪落。所以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國外。美國援助南京這麼久了，花的錢不為不多，但是結果如何呢？若干現實的美國政界人物開始認識和憂慮這個極小的傀儡舞台乃是一個極大的無底洞，於是蔣介石、孫科之流不得不拿出他們這假賬的天才，這無疑是南京一切貪官污吏們最熟練的職業，來企圖轉變這些美國人的情緒，使他們不僅不動搖，而且更加起勁的填滿這個無底洞。蔣家小朝廷第一是要使美國主人們生氣，出面反對所謂蘇聯的「侵略」；第二是要使美國主人們害怕他的兒子們登報脫離父子關係。這後一種戰術，按照南京國防部的習慣，應該定名為「打滾戰術」。蔣介石不但指揮孫科表演過，而且他本人也親自表演過，而且都會經行之有效。這一次是否仍然有效，還須聽下回分解。但是，可以預料的，是有一部份美國人將如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似的，將五指罩住茴香豆的碟子連說：「多乎哉。不多也。」而另一部份美國死硬派則仍將或明或暗地給以軍事和財政的援助。中國和美國的人民必須繼續堅決反對任何這種罪惡的援助，因為這足以延長中國的混亂和痛楚，這個事實已是比任何時候更加明白了，但是堅持「打到底」的南京劍子手們無論如何却永遠不能由此得救，蔣介石、孫科以及其他任何人由此所構的禍國殃民的血債愈多，到「終歸可以解決」的一天，他們就必須向人民付出更大的利息。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

